

# 《與魔鬼交往》和心理史學

• 邵東方

約翰·普特南·迪莫斯 (John Putnam Demos): ——《與魔鬼交往：巫術和早期新英格蘭的文化》(*Entertaining Satan: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82, 543頁。

在美國，對早期新英格蘭巫術活動的研究一直是歷史學家極感興趣的題目。迪莫斯的《與魔鬼交往》一書試圖用跨學科史學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主要是心理史學 (psychohistory) 的方法來研究十七世紀新英格蘭的巫術活動和女巫審判事件。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努力通過人口歷史學、歷史社會學和心理史學進行史學研究已成為一種新潮流。這種學科間的相互跨越溝通，看來特別適合於對巫術活動的研究。」(頁viii)

跨學科史學的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史學方法不同，它是將兩種或更

多種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用於歷史研究。伊格爾斯 (Georg Iggers) 指出：「歷史學應當成為一門社會科學 (引者註：在西方，歷史學通常屬於人文學科)，借助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去尋求歷史的解釋。」(《歐洲史學新方向》*New Direction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社會科學的方法能够使歷史學家視野開闊，更加準確、深刻地解釋他們的判斷和假設。儘管早在古代史學中，就有人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注意到心理分析和歷史研究的關係，但是心理分析的方法真正應用到史學上，還只是在本世紀50年代才流行起來的。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曾給心理史學下過這樣的定義：「心理史學實質上就是用精神分析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人和群體的生活。」(《新的同一範圍》*Dimension of A New Identity*) 由於人類的內心世界是在外部世界的結構中發展起來的，心

由於人類的內心世界是在外部世界的結構中發展起來的，心理分析方法能夠使歷史學家在較深的層次上全面地觀察人類的內心活動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影響。

理分析方法能夠使歷史學家在較深的層次上全面地觀察人類的內心活動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影響。

在《與魔鬼交往》一書中，迪莫斯採用多維的方法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對十七世紀新英格蘭的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等地區，除了早經研究過的塞勒姆 (Salem) 鎮外，發生的巫術活動和對女巫的審判過程，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該書共分四部分，以不同學科方法作為各部分的標題：(一)「傳記」，(二)「心理學」，(三)「社會學」，(四)「歷史學」。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描述了從事巫術者的

個人歷史和共同特徵，說明哪些人屬於巫師及她們是怎樣成為巫師的。作者在第二部分裏利用心理學的方法對女巫和原告雙方的內心活動進行分析，從而揭示出早期新英格蘭文化的更深層次，即不同類型人們的感情和意識。在第三部分，作者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了當時巫術盛行的社區 (communities)，力圖反映審判女巫事件對早期新英格蘭社會的影響。作者在最後一部分中，以歷史學家的眼光，觀察了巫術活動的發展過程、變化和結果，進而解釋了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環境與巫術活動之間的關係。迪莫



斯指出，「巫術絕不是脫離新英格蘭早期歷史而獨立存在的現象。相反，它實際上從始至終都是那段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頁386)

迪莫斯大量利用的材料多是過去為傳統史學家在研究巫術活動時所不着重的資料，如當時縣級法庭的審判記錄、法律證書和原始檔案。迪莫斯在該書中，不僅僅把對女巫的審判看作是聳人聽聞的案件，他還列舉了許多具體的社會現象，如社會的變態、女巫和受害者的關係等，從而使人們看到巫術在新英格蘭地區流行的情況，以及對早期美國文化發生的作用。

迪莫斯將他的心理史學研究模式概括為四點：(一)現代心理學的「發展性理論」(developmental theory)和臨床資料，(二)十七世紀時撫育兒童的觀念，(三)清教徒的價值觀，(四)女巫審訊的具體案例。(頁208)他把這四點綜合運用，對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探討。比如，在討論巫術案發生的原因時，他看到「巫術罪的定案是與矛盾糾紛有關係的，大部分關於巫術的指控實際上起因於某一具體事件的糾紛。」(頁86)書中最精采的部分是，迪莫斯生動地描寫了與巫術事件有關聯的人們的內心世界活動。他注意到，由於各種複雜的心理因素，使得女巫審判中的各方緊緊地糾纏在一起(頁197)。迪莫斯發現，從事巫術的人大多是中年婦女，而她們施行巫術的對象又多為婦女。因而他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初期自戀」(primary narcissism)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他認為，所有由母親撫養大的嬰兒一般都潛藏着

仇視其他成年婦女的意識。如果嬰兒經常受到母親的某種程度的虐待，這種記憶的痕迹以後便形成對婦女的仇視。他把男人排除在外，認為男人「代表着理性、邏輯、平衡和『最為純淨的人類』」(頁203)。而婦女則可能由於某種「貫通文化性的仇視婦女基質」(misogynist substrate of transcultural dimensions)而參加巫術活動。(頁205)他還討論了更年期對婦女巫術活動的影響。

《與魔鬼交往》一書也存在着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迪莫斯在分析女巫案件時，過分依賴精神分析的理論，有時甚至超過對原始材料本身的信賴。由於他對科胡特(Heinz Kohut)的「自身心理學」(self-psychology)理論懷有一種偏愛，因此常常用心理分析的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事實。例如，他過分強調兒童為爭取其「自主性」(autonomy)所作的努力對其成年後行為的作用。又如，他未能清楚地區分十七和二十世紀人的青春經歷究竟有何不同。最後，雖然迪莫斯成功地描寫了巫術受害者的心理，但他卻未能對巫術事件中的最主要角色，即女巫的內心有足够的揭示。這也許是該書的最大缺陷之一。

因此，在不少歷史學家看來，心理史學的分析結果經常使人難以相信。正如布賴薩奇(Ernst Breisach)所說的那樣：由於心理史學的「理論基礎尚不扎實並且也還不具有條理性，因此心理史學的分析還是不很可靠。……對於那些思維嚴謹的歷史學家來說，證據和

迪莫斯發現，從事巫術的人大多是中年婦女，而她們施行巫術的對象又多為婦女。



心理史學解釋之間的聯繫總是不那麼令人信服」。《《史學史》*Historiography*》心理史學的一個特點，就是把某個人成年時期的行為，歸結為他在孩提時代形成的各種心理形態的綜合表現，說成是沒有得到滿足的潛意識的反映。對此，余英時教授指出：「從史學家的立場說，我們不但不能把任何歷史人物的一生完全化約到童年以至青年的一

段，而且更不能把人的意識層面的東西完全化約到潛意識層（the unconscious）去理解。」（《年譜學與現代的傳記觀念》，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儘管如此，不少學者仍然認為，心理分析雖然不能解釋整個歷史事件，但是卻有助於說明早期的心理活動與人生發展後來階段的某種聯繫，以及意識和潛意識兩個層面之間的關聯。這也是《與魔鬼交往》一書引人入勝、受到很高評價的原因之一。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活動（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群體的）對歷史的發展總會產生一些影響。比如有的史學家就曾指出，毛澤東向朱元璋認同的問題，可以為心理史家分析毛澤東的歷史人格提供極有意義的線索（余英時：《史學與傳統》）。總之，在史學研究中，吸收和運用心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可以豐富和加深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和認識。

**邵東方** 江蘇南通人。上大學之前是北京內燃機總廠三級鉗工。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學士和碩士後，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中外古史比較研究室工作。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博士生。